



幸福院的煤油灯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林

我的童年是跟随母亲在幸福院度过的，那时乡下经常停电，照明常常得靠煤油灯。

母亲是南川合心公社幸福院的院长，带着一二十名孤寡老人、孤儿过日子。我记得小时候幸福院有8盏煤油灯，大堂屋常用两盏，其余的房屋都配有一盏，起居用。母亲后来又添置了两盏马灯，马灯防风，手提着，走夜路方便。幸福院有一盏铜座子的大煤油灯，有罩子，灯芯是用棉花搓的，灯火大，这盏灯是孤儿们围着一张大的方桌子读书做作业时才用的。后来，孤儿们把用过的墨水瓶洗干净，找来一根竹筒子，把棉花搓成条，做了些简易的煤油灯，也能增添一些光亮。每年的大年三十，老人和孤儿们都要把自己房间里的煤油灯拿出来，把堂屋照得通亮，一屋子的人在红红的一闪一闪的灯火下，欢欢喜喜过个年。

这年中秋，母亲在外地请了个照相的，要给孤儿和老人们照张相，照相师傅一大早就在幸福院的院子里摆好了架势。孤儿和老人都没照过相，都好奇地看着师傅摆弄，大小近二十人兴奋着先照了合影。这年我三岁，母亲要给我单独照张相，我哭着，要横不照，母亲哄着，给了我一包用黄色草纸包好的黄糖，还让我提上那个大铜灯，我才勉强坐在一根小木凳上，留下了红红的脸蛋挂着泪珠的人生第一张照片。照相师傅在给孤儿们照相时，母亲都让孤儿们提了盏灯，后来听母亲说起，手上提着灯，才不怕黑暗，今后走的路才亮堂。

20世纪70年代的乡下，能看上露天电影已是难得的文化生活享受。有露天电影的那天，母亲会早早做好饭，孤儿们也是急匆匆吃完饭，带上小木凳，就随母亲去五公里外的公社革委会前的坝子看电影。当天边最后一抹彩霞消失在大山之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同一部电影都重复看了多遍，可每次放映还是有好多人在看。那个年代乡下的露天电影一

般都是放两部故事片，一部纪录片，两三个小时后散场。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让孤儿们手拉着一根绳子，这样可防止走丢、摔倒和恐惧。母亲走在最前面，手里提着马灯，年长的孤儿走在最后，大家就跟着马灯的光亮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伴着月亮，踏着石板路回家。这个时候，夜色里的马灯，尽管光亮微弱，但在幽静的小路上，却是黑夜里的温暖，一盏灯，似乎让黑夜不再黑暗。

幸福院是孤儿们成长的家园，也是孤寡老人们最后的归宿。岁月在老去，孤儿们在长大，老人们也在老去。当这些在幸福院生活了一二十年的孤寡老人“油尽灯灭”的时候，乡下习俗，要在逝者的停放处点上一盏油灯，好让逝者能找到来时的归路。母亲不信鬼神，但想到给活着的老人一个心安，每当有老人过世，母亲都会为离去的老人点上一盏灯，还在另一边的木板墙上挂一盏陪伴了老人多年的煤油灯，似乎在为老人照上最后一程。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什么文化，1949年后进过识字班，讲不出多少人生的大道理，却会常用一些直观的比喻引导和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人生。我参加工作后，经常通宵加班，每次回家后，母亲都会唠叨，说人就像油灯一样，不注意休息，灯里的油就燃得快。每当我出差时，母亲就说，要注意安全，尽管灯里还有油，如果灯都摔坏了，油还有什么用。每当我喝酒过量了，母亲就说，又在浪费生命里的油。我生了小病，母亲就说，要到医院去看病，就像油灯的油进了灰尘，要把它清理掉。上了年岁的母亲，有时还自责，说怀上我的岁月，生活很苦，营养不足，先天给我生命里油灯中的油就不足。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就听了，在母亲离去后，每当想起这些发黄的记忆，眼里总有幸福的泪水。

母亲50岁时离开幸福院，到了县城生活。这时乡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走夜路都用手电筒，幸福院那些煤油灯，连同母亲在幸福院赡养老人和哺育孤儿的时光，都尘封在了逝去的岁月里。离开幸福院这天，母亲挑了那个铜座子的煤油灯，看了又看，似乎在寻找这些年生活的痕迹，然后细心地用一块蓝色绸布把灯包好，放进了木箱子里。这个经过时间洗刷后的铜灯，一直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至母亲离去。

母亲走后，每当我看到这盏煤油灯，就回忆起母亲在幸福院几十年如一日的岁月，这时我脑海里就总闪现出母亲在煤油灯下为孤儿们缝补衣服和为老人们洗脚剪脚趾甲的场景。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幸福院的煤油灯的光亮尽管微弱，但能把温暖深深地照进老人、孤儿和我的心里。

船工号子，川江上远去的劳动交响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

“哎！穿恶浪哦，踏险滩哟。船工一身，都是胆哪；闯漩涡哟，划激流哦……”前不久，我路过川江巴阳峡畔一个叫太阳溪的地方，听到久别的船工号子。

巴阳峡简称巴峡，位于重庆市万州区东部与云阳县西部的交界地段，峡长约9公里，枯水期江面最窄处仅80米，最深处达44.2米，曾是长江川江段以险、窄著称的天然航道“咽喉”。太阳溪地处巴阳边的175米水位线上，为万州区三峡移民的一个后靠安置点。川江号子是昔日川江流域的船工们为协调劳动节奏、缓解疲劳而创作的民间歌唱形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具有“一领众和”的特点，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施系统性保护与传承创新。

循声而去，我们见到川江船工号子的传承人——任开和、向家云、向家元、陈乾伦、张绍池。尽管年事已高，五位古稀老人依然面容红润，耳聪目明，声如洪钟，腰板笔直，风采不减当年。

曾担任川江船工“号子头”（负责领唱号子的人）的任开和介绍，川江船工号子按行船方向分为上水号子与下水号子两大体系。上水号子以人力对抗逆流，有离岸的撑篙号子、深水划行的扳桡号子、浅滩集群牵引的拉纤号子、过桥操作的抬桅号子等；下水号子则需驾驭顺流速力，包括启航的顺流号子、稳流的平水号子、闯滩的号子“三部曲”（见滩—闯滩—下滩）、调速用的二流橹号子等。

有时，“号子头”还会根据河段的水势水性不同、明滩暗礁对行船存在的安全性，编创出一些不同场景、不同音调、不同情绪的号子，提醒后面的船工及早采取措施。如：号子头喊“大浪凶得很”，后面的船工心领神会，应“脚步踩得稳”；前面是一片平坦水域，号子头喊“平阳大路”，后面的船工乘势前进，应“迈开大步”；行进的江面又变得狭窄，号子头喊“羊肠小路”，后面的船工相机行事，应“放缓脚步”……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钢质机动船的普及使川江木船逐渐退出货运主流。2003年6月，三峡工程初期蓄水135米后，巴阳峡部分险滩开始淹没；至2006年水位升至156米，传统航道完全消失。任开和等作为川江巴阳峡段的最后一代木船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涛声不断歌不断哪，回声荡漾白云间哪，高峡风光看不尽哪喂，轻舟飞过万重山哪喂！”如今，任开和等老船工还经常去巴阳峡边，观看“高峡出平湖”后形成的“巴阳峡画廊”美景。回忆起拉船的那段过往经历，大家还会喊上几段川江船工号子，把昔日川江船工具有的“脚蹬石头手扒沙”的顽强意志和“风里浪里不回家”的坚韧性格一一展现……

后坡那棵老鹰茶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治刚

西南地区有一种不寻常的茶树，人们叫它老鹰茶树。说它特别，主要因它长得很高大，又不择生长的土壤。在我家后山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就生长着一棵老鹰茶树，差不多有5米高。从我记事起，它就独自立在那儿。日复一日，与风霜为伴；年复一年，与雨雪为友。

一棵茶树生存的最大价值，莫过于得到采茶人的青睐，而春芽又是人们的最爱。在我童年时，每年清明前后，母亲就会到后山坡采春芽。天刚亮，她就出发了。可等她拎着竹篓来到树下，低处的芽早被采光了。剩下的新芽都在树尖上，晨风中，卖弄着婀娜的身姿。母亲只好搬来那架三条腿的木梯，我蹲在底下用肩膀顶着梯角，看她踩得木梯“咯吱咯吱”响，左手攀着树枝，右手飞快地拧下芽头，“簌簌”地掉进竹篓里。不一会儿，竹篓就满了。母亲用手往下按了按，直到再也装不下才罢手。

接下来就是做茶了，做茶的讲究少。母亲把鲜叶摊在竹匾里，路过时就翻一遍，叶子在她手里“沙沙”响，像搓洗红薯淀粉。晒茶不能暴晒，得搁在屋檐

下，让太阳斜斜地照，风轻轻地吹。隔壁王婶说：“这茶是喝风长大的，急火烤不出山味。”晒上两三天，叶子蔫巴巴的，母亲就坐在门槛上揉茶，手掌在簸箕里转圈圈，揉出的茶叶染黄了指尖，闻着有股清苦的香。

煮茶得用土陶壶，壶是祖上传下来的，壶身刻着模糊的纹路，倒茶时“呼噜呼噜”响。山泉水烧得冒白气，往壶里一冲，茶叶在水里打旋儿，先是飘出股樟树香，接着就漫出股烟火气。头口茶喝着涩，像咬了口生板栗，咽下去却回甘，喉咙里凉丝丝的。下地的汉子从我家路过，都要喝上一碗，然后把粗瓷碗往石头上搁：“这茶比二锅头还带劲！”

冬天，火塘熏茶是件热闹事。父亲砍来新枝，把茶叶串成串，吊在火塘上方的吊钩上。夜里烧火煮饭，青烟裹着松木香往上蹿，把茶叶熏得油亮。熏好的茶装在铁皮罐里，能存一整年。下雪天围着火塘喝茶，茶汤酽得能挂碗，喝一口浑身暖烘烘的，比盖三床棉被还舒坦。老辈人捧着碗叹气：“当年走夷方，就靠这口茶撑着脚力。”

如今，城里的茶馆越开越多，玻璃杯子里泡着嫩芽，透亮得像工艺品。可我总觉得少了点啥——没有木梯摇晃的吱呀声，没有火塘熏茶的烟子味，连茶叶在壶里翻滚的声音都不一样。有次在商场看见卖老鹰茶的，包装上印着“山林秘境”“古法工艺”，买回家一泡，涩得直皱眉——到底不是后坡那棵老鹰茶树的味道。

前段时间回老家，邻居阿婆在采那棵老鹰茶，她说每年都会采一轮。她腰弯得更厉害了，但动作仍旧那般麻利。我接过竹篓帮她递叶子，指尖触到嫩芽上的白绒，还是当年那般香嫩。母亲到城里后，已很多年没回老家采茶了。我想，有人年年采摘才好，这棵老鹰茶树才能恒久地彰显它的价值，也才会越活越有精神。山风掠过树冠，满树叶子沙沙作响，像在说些老辈人的故事。

这茶树，年年抽新芽，年年被采摘，可根还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扎着，就像山里人的日子，苦甜都泡在这碗茶里，浓得化不开。